

唐诗 接受研究

张浩逊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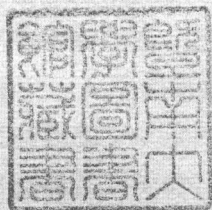


浙江古籍

I207.227.64
J0113

唐诗 接受研究

张浩逊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唐诗接受研究 / 张浩逊著. —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80715-612-3

I. ①唐… II. ①张… III. ①唐诗 - 文学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14322号

唐诗接受研究

张浩逊 著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责任编辑 陈临士

激光照排 杭州万方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 / 32

印 张 9.75

版 次 2010年12月1版1次

书 号 ISBN 978-7-80715-612-3

定 价 30.00元

序

唐诗学作为一门研究唐诗的专门学问，涵盖了十分丰富的内容，包孕着众多的研究课题。她可以宏观考察唐诗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进行唐诗发生、发展的轨迹研究，也可以对作家作品、创作群体、体式风格的个案进行研究；可以做唐诗的衰辑、甄辨、考释、笺注、解读的工作，也可以做研究资料的辑集、诗人年谱的编写、唐诗的理论阐发，与其他学科作比较、融通研究。唐诗研究还有横向研究和纵向研究的区别。探索唐诗与唐代历史社会、政治风云、哲学思潮、仕宦心态、民俗风情、文坛风尚等的密切联系，这是唐诗的横向研究。探索唐诗的艺术渊源，唐代诗人是如何汲取前代诗歌创作的精髓；又，探索唐诗对后代诗歌和文学创作的浸润、作用和影响，后代诗人、学者是如何流播存留唐诗、如何传承借鉴唐诗、如何探索唐诗的艺术奥秘，也就是接受学的种种范畴，这是唐诗的纵向研究。

运用多种研究手段，展开多层面的专题研究，使唐诗学逐步深化，帮助人们多视角、全方位地认识唐诗深远的历史文化意义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上述学术思想始终贯彻在我的教学中，也体现在我的学术论文里。

张浩逊从我治唐诗，熟悉我的学术思想，深受我唐诗研究的影响，所以，很早就关注唐诗的纵向研究，从事后代文人接受唐诗的专项研究。他先后在十余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卓有见地的唐诗接受学方面的论文。今年，他将历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了大幅度的修改、润色，并补写了若干章、节，结集成书，题曰《唐诗接受研究》，即将付梓，约我写序。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义不容辞地应该说几句话，容申我庆贺、鼓励之意。

唐诗接受学的专著，有六年前刘学锴先生的《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刘先生是国内享有盛名的李商隐研究专家，由他来阐述后代文人对唐诗大家的接受历史，自然能鞭辟入里，精深透彻。浩逊同志的著述既能从刘著中受到启迪，取得借鉴，又能另辟蹊径，抓住“唐诗接受”这个大题目，进行宏观考察，拓展思路，别开生面。笔者认为本书有如下三点胜处可以说一说。

首先，指导思想明确。这部书的指导思想，就是唐诗接受的四个基本特性：普泛性、时代性、个体性和应用性。这四个特性的体识和把握，是作者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反过来，他将它们贯穿到日后的研究中来，浸透在全书的字里行间。以这种学术思想为指导，作者全方位地认真审视了唐代及以后各个历史阶段，直到现当代人们对唐诗的种种接受，包括辑集整理、庋藏保护、注释解读、阅读欣赏、评论研究、汲纳借鉴、传播推介等诸多层面，举出许多生动有趣、无可辩驳

的实例，具体阐述了唐诗接受的四大特征，可以让大家深切地感受、认知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与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不论昨天、今天还是明天，华夏民族的子孙后代都永远热爱唐诗，通过唐诗汲取有益于人生的生活态度、人文精神和美学追求，促进我们当今和未来的诗歌创作，让诗意生活常在，诗的艺术光辉永存。

其次，全书视野开阔，涉及面广，点面结合，结构严整。整体的唐诗接受研究不同于对个体的接受研究，作者必须将视点拓展到全唐的各个时段，宋、元、明、清各个时代。视野开阔，涉及面广，才能涵盖唐诗接受的全貌；但受到全书篇幅的限制，又不能面面俱到，泛泛而谈。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作者采取点面结合的办法，选择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专题研究。他将整个唐诗接受史纳入到四个板块中，即甲编为唐人对唐诗接受的盛况；乙编为古代（宋、元、明、清）文人对唐诗接受的盛况；丙编为现当代诗人对唐诗的接受盛况；丁编为现当代学者的唐诗研究。精心遴选接受人（诗人或学者），这些人必须富有特色、具有代表性，如选择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女词人李清照、历史名人文天祥、元末明初画家兼诗人王冕、明代画家兼诗人唐寅、清初文学批评家金圣叹、著名小说家曹雪芹、帝王诗人爱新觉罗·玄烨、现当代伟人毛泽东，都出于这种考虑。作者藉此把握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不同个性的人物对唐诗各具特色的接受（包含思想感情、道德情操、审美情趣乃至创作评论诸方面的多元化接受），从而深切感受到唐诗之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艺术魅力。

再次，全书新义迭见。学术研究贵在创新，作者在“唐诗

接受研究”这个大框架下，不断写出新东西，使人耳目为之一新，这是本书最令人瞩目的一个亮点。这可从两方面加以说明。

一、从大家熟悉的诗人中揭示出新的见解来。比如杜甫诗，作者一反“杜甫生前未有知音”的旧说，用大量有力的论据，论证杜甫生前已名满天下，与李白齐名，杜诗已经得到当时人的接受。“李杜同时人”任华评杜诗“势攫虎豹，气腾蛟螭”，称他“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杂言寄杜拾遗》）；郭受的《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说杜甫“新诗海内流传遍”，“衡阳纸价顿能高”。又如文天祥，大家都注意到他后期诗作与杜诗的关系，因为他写了不少“集杜诗”；作者通过《文天祥全集》发现文天祥的前期诗作同样受到杜诗的浸润，学杜迹象明显。陈寅恪先生的唐诗研究早已受人关注，当今学者对二十世纪唐诗研究作回顾时，总要提到他的代表作《元白诗笺证稿》及其娴熟运用的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作者在此基础上，通过细读其唐诗研究的相关著述，明确指出寅恪先生的唐诗研究还有其他一些方法，如比较研究法、历史文化法、考核阐义法，在前人基础上推进了一大步，这确是新见。

二、作者下功夫研究新课题，努力推出新成果。较典型的例子是《论王冕对杜甫诗歌的接受》一章。王冕以画梅擅名，也就掩其能诗名。作者通读《竹斋集》后，发现王冕最仰慕的唐代诗人是“李杜”，而在诗歌创作时接受杜甫的影响更多一些。清宋荦为顾嗣立《元诗选》所作的序言中，说“元诗多轻扬，近太白”，“元人学温、李为多”；作者却专论王冕对杜诗的接受，从运化杜诗、钟情五言律、审美情趣几个方面，论述了王冕接受杜诗的基本特点，进而指出王冕接受杜诗的深层原因

还在于他和杜甫的生活遭际相仿：都有济世惠民的抱负、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样就使相隔六七百年的两位诗人心灵相通，成为王冕接受杜诗的深厚人文基础。清代爱新觉罗·玄烨（康熙）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也是一位学识宏富、才情横溢的诗人。这位曾为《全唐诗》作过序的帝王，他的诗歌评论多赞扬唐诗之语，他的诗歌创作颇受唐诗影响。他特别喜爱唐太宗、王维、李白、杜甫的诗歌。这个问题，前人几乎没有谈过，作者专设一章，分别阐说了玄烨对唐太宗、王维、李白、杜甫以及唐代其他诗人的接受，全面论述这位全身心、多层面接受唐诗浸润熏染的特殊诗人。此外，论唐寅与“二白”（李白、白居易）诗的关系，论金圣叹的“拟杜诗”等，也与上述两章一样，都能体现出作者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的学术追求，确实难能可贵。

作者年轻时就喜欢读唐诗，油灯下、风雨夜，孜孜不倦，自有一番风味。四十余年来，他由读唐诗到教唐诗，进而研究唐诗，现今头有二毛，依然以唐诗为伴。这不是简单的重复，他经历了认知道路的长期跋涉，更实现了知识积累的跨越，写出了《唐诗接受研究》的专著，为唐诗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愿在未来的时日里，能看到作者更多更好的唐诗学专著。用企盼语作本文的结束语，不亦宜乎！

吴企明

二〇一〇年七月五日

于苏州莲花苑寓所

唐诗接受特征论(代自序)

唐诗，以其清畅的语言、鲜活的兴象、深邃的意境、悠长的韵味，自它产生之时直至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一直受到人们的赞赏。尽管中国古典诗歌源远流长，历朝历代都有不少佳作传世，宋诗还被一些专家誉为可与唐诗双峰并峙、两水分流，又有专家认为清代诗歌可以“抗衡唐宋”（钱仲联语），事实上，没有哪一个朝代的诗歌能够拥有比唐诗更多的读者。唐诗接受的广度、深度和持久度都是无与伦比的。

下面着重论说唐诗接受的四个基本特征。

一、普泛性特征

这一点可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首先，无论是上流社会还是下层民众，都对唐诗有巨大的接受热情。以盛唐大诗人王维诗歌的水平接受情况为例，《旧唐书》本传说他“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

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1]。这说明了上流社会对王维诗歌的喜爱。王维的有些诗还被采入乐曲到处传唱，如《送元二使安西》诗，虽然尚不清楚它入乐传唱的最早时间，但我们据刘禹锡《与歌者诗》“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句，以及白居易《对酒诗》“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句，可知它在中唐时期仍是一首流行歌曲。据晚唐范摅记载，在安史之乱期间，王维的另两首诗《相思》（红豆生南国）、《失题》（清风朗月苦相思）曾被流亡到湘中的著名宫廷音乐家李龟年演唱过。范摅在说完这件事后还写下了“至今梨园唱焉”^[2]这句话。被歌手传唱，诗歌的接受层面就不会局限于达官显贵，还必定包括了社会下层的引车卖浆者流。又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白居易，他的诗歌不但为当时文坛所重，而且在下层社会广为流传。其《与元九书》云：“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嫖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作七律《吊乐天》悼念他，后四句“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也充分说明了白诗接受的普泛性。

其次，从垂直接受层面看，唐代至今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大量的唐诗爱好者。宋代的重要诗人如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都从唐诗中汲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欧阳修诗受韩愈影响较大，主要体现在以散文手法和以议论入诗。另外，他还学习李白清新流畅的

[1] 刘昫《旧唐书》第15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52页。

[2] 范摅《云溪友议》卷六，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75页。

诗歌语言。梅尧臣自称所师法的唐代诗人有李益、宋之问、张九龄、王维、贺知章。王安石曾选杜甫、欧阳修、韩愈、李白四人诗作《四家诗选》。他在晚年所写的一些抒情写景小诗，风格以冲淡为主，与王维等人的山水田园诗的丰神远韵十分接近。苏轼常在诗中以李白、杜甫自况，他盛赞“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1]其豪放诗风，受到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影响；其平淡诗风，得益于韦应物、柳宗元、白居易。黄庭坚是宋代最有特色的诗人，他被后来的江西诗派奉为主臬，但他的诗在炼字、造句、谋篇等方面都借鉴了杜诗的艺术经验。陆游十分推崇王维、岑参、李白、杜甫等唐代诗人。他在十七八岁时“读摩诘诗最熟”（《跋王右丞集》），又“绝好岑嘉州诗”（《跋岑嘉州集》）。在他的诗集中，称颂李、杜的言辞更是不胜枚举。当时人称他为“小李白”或“前身少陵”，就是看出了其诗有李白之壮浪、杜甫之沉郁的某些特征。杨万里对晚唐诗特别是陆龟蒙诗尤为欣赏，他曾赋诗云：“晚唐异味同谁赏，近日诗人轻晚唐。”（《读笠泽丛书》）但他又不专主晚唐，其七言古诗《重九后二日同徐克章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想象奇特，形象潇洒，语言浅畅，显是脱胎于李白之《月下独酌》。他自己也说：“老夫此作，自谓仿佛李太白。”^[2]范成大描写田园风物和民生疾苦的诗，受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人的新乐府诗影响不小。他还有意学李白、杜甫、韩愈、杜牧等人。宋代以下的元、明、清各朝，喜爱、推崇、学习唐诗的文人不胜枚举，此不词费。

[1] 苏轼《东坡题跋》，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页。

[2]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163页。

当今社会，唐诗仍然拥有众多的接受者。且不说唐诗研究已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的显学，也不说中、小学语文教材选入了许多唐诗，单看书店柜台上五花八门的唐诗读本，就足以让人惊叹唐诗之“火”了。再环视我们身边，几乎每一个幼儿的家长都在教孩子背诵李白的“床前明月光”，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王之涣的“白日依山尽”。尽管这些幼儿可能并不知道这些都是唐诗，但新一代的唐诗接受者事实上已悄然形成了。

第三，唐诗在国外也有不少爱好者、研究者。例如白居易的诗，早在他在世时已远播到新罗（朝鲜古王朝）、日本、日南（今越南境内）等地。日本平安朝（约中唐时期）的嵯峨天皇所写的《杂言渔歌》五首，明显受到中唐诗人张志和所作《渔父词》的影响。在嵯峨天皇以后的百余年间，日本诗歌界热衷于模仿唐诗，如著名的万叶诗人大伴旅人的《赞酒歌》十三首，显是模仿李白《月下独酌》诗而作。近代学者俞樾在《重修寒山寺记》中说：“余寓吴久，凡日本文墨之士，咸造庐来见，见则往往言及寒山寺，且言其国三尺之童，无不能诵是诗者。”近些年来，每到年末岁尾，都有不少日本友人来苏州旅游，到寒山寺听钟，其缘由就是因为张继的《枫桥夜泊》诗在日本流传很广。自18世纪下半期开始，法、英等国汉学家陆续把唐诗介绍给西方国家。据今所知，唐诗的外文译文已有英、法、德、意、西、葡、瑞典、荷、俄、罗马尼亚、匈、捷、波、阿尔巴尼亚、日、朝、越、马来西亚、泰等文种。^[1]这些外译出去的唐

[1] 王丽娜《唐诗在国外》，《河北师院学报》，1990年第1期。

诗，自然培养了一批唐诗的国外接受者。如在 20 世纪初兴起的美国新诗运动与意象派诗歌，就受到唐诗的深刻影响。美国新诗运动最有力的推动者埃兹拉·庞德曾选译中国十九首古诗编辑成《神州集》，其中唐诗占十四首。庞德的诗集《诗章》中的不少作品，明显模仿了唐诗。1985 年 7 月，在巴黎市长的倡导下，巴黎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国诗歌表演会，演员们对王维、李白、杜甫诗歌的传神表演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就研究层面而言，美国可说是目前西方世界唐诗研究的中心，日本则是除中国外东方国家的唐诗研究中心。

二、时代性特征

有些唐诗描画、咏赞壮丽山川，或抒写人类永恒的情感，如亲情、友情、爱情、乡情等，其接受的时代性特征并不明显，像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孟郊的《游子吟》等。而有些作品则不然，由于其在内容上的特殊性和风格上的特异性，身处不同时代的接受者会对其产生不同的阅读兴趣，从而造成唐诗接受的时代性特征。

人们对于杜甫诗歌的接受是一个明显的个例。可以这么说，在旧时代，每当国家危急、民生艰难之际，就是杜诗大受推崇之时。白居易目睹了下层民众的艰辛人生和官府横征暴敛，才对“三吏”等诗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诗句大为赞叹（见《与元九书》）。他大写新乐府诗，正是对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北宋初期，天下安定，诗坛盛行“元白体”、“西昆体”、“晚唐体”，杜甫诗歌未能受到重视。北宋末年，国势殆危，杜诗的现实意义得到凸现。抗金名将李纲就说：“（杜

诗)时平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诵其词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为古今绝唱。”^[1]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十分倾心杜诗,特别是他在燕京狱中所作的二百首集杜诗,最能体现他对杜诗的无限深情。南宋宫廷琴师汪元量随宋室帝后被俘北上,作有《醉歌》、《湖州歌》、《越州歌》一百多首七绝,真实地描写出南宋王朝覆灭的过程,语言朴素,笔致沉痛,颇有杜诗遗风。他本人也说:“少年读杜诗,颇厌其枯槁。斯时熟读之,始知句句好。”(《草地寒甚,毡帐中读杜诗》)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不少文化人如闻一多、老舍、冯至、萧涤非等颠沛流离,漂泊西南。深重的民族灾难,使他们真正认识了杜诗的价值。闻一多在1944年9月发表《诗与批评》一文,他认为杜甫与陶渊明、谢灵运不同,陶、谢不管人民的苦难,只为自己的愉悦写作,而杜甫能同广大的社会和百姓“同其欢乐,同其悲苦”,“他为社会与人群而振呼”^[2],所以,杜甫足当一等诗人的称号。冯至早年读了不少唐诗,不过那时他最喜爱晚唐诗,直至人生中途,因抗战爆发,他辗转各地,对杜诗有深切的体味,方才倍感亲切,这也是他写《杜甫传》的直接动因。

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氛围、文化思潮和审美观念也会造成唐诗接受的时代性差异。在比较开放和自由的唐代,多写自我、张扬个性的李白诗,能受到普遍的赞誉。但到了宋代,统治者以崇儒为治国之本,主流文化十分认同杜甫的忠君爱民思想,而对兼杂儒、道、侠、纵横家思想的李白持保留态度,

[1] 仇兆鳌《杜诗详注·附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46页。

[2] 《闻一多全集》第2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页。

李白精神与理学思想相悖，加上李白洒脱不羁的诗风与以筋骨思理见长的宋诗迥异，所以李白诗歌未能得到普遍认同，如王安石、苏辙就对李白诗有所批评。在明代中后期，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民主启蒙思想有所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标准发生了变化，对李白诗的正面评价也随之升温，晚明许学夷就明确表示王安石、苏辙对李白诗的批评是“俗儒之见”^[1]。

三、个体性特征

具有多样化风格的唐诗，是由兼具不同的思想观念、艺术才能、审美情趣、气质个性的诗人创造出来的。诚如刘勰《文心雕龙·情性》所言：“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譎，文苑波诡者矣。”唐诗的接受者，也会因着各自不同的情况去接受喜欢的作品，漠视或闲置自己所不喜欢的作品。西方接受美学认为，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由于所处的地位、境况、经历以及文化水平、审美趣味、性格、气质等多种因素，形成了他接受艺术作品的“前结构”，这种“前结构”也就大致构成了接受者的期待视野。假如艺术作品不能联系接受者的“前结构”，不能满足或大致满足接受者的期待视野，那么，接受者就会对这样的艺术作品予以排斥。在唐诗接受过程中，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这就是唐诗接受的个体性特征。

以毛泽东为例，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爱读唐诗。综观毛泽东所喜爱的唐诗，主要有以下三类：浪漫气息浓厚、具有积极向

[1] 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十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页。

上精神的；情意深长、委婉动人的；评说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前两类，与毛泽东的性格、气质和审美趣味有关；后一类，则与他的政治身份有关。于唐代诗人中，他最欣赏的是李白、李贺。究其原因，首先是二李的诗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这与毛泽东本人的精神气质有相似之处；其次是李白、李贺的诗富有进取精神和叛逆旧传统的强烈意识，这又与毛泽东的情性、志趣相一致。郭沫若的情况也大致相当。他自言在九岁左右读诗时就产生了一种连他本人都感到“有点奇怪的现象”：“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1]需要辨明的是，郭沫若年少时“不甚喜欢杜甫”，是因为杜诗格律谨严，感情凝重，用典较多，不易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阅历的丰富，他对内容深广、感情沉郁的杜诗是日益喜爱了。他在后来的诗文里，引用、借鉴杜诗颇多，甚至还有不少是直接或间接赞颂杜甫、杜诗的。如他在1953年为筹建中的成都杜甫草堂纪念馆撰写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至于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著《李白与杜甫》贬低杜甫，那是特殊年代的特殊情况，另当别论。

四、应用性特征

一般的读者接受唐诗，主要是为了从中得到审美满足或心理慰藉，或者还想从中了解唐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灵世界。但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他们接受唐诗还有另一层意义，即考虑如何从中汲取艺术营养，滋养自己的文学之树。刘勰在谈到屈原

[1]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作品对后代诗人的影响时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借用这一段文字来说明唐诗对后代文人的影响，也是恰当的。

且不说唐以后的诗人对唐诗的学习、借鉴、挹取——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这里单看宋代词人和元曲作家取鉴唐诗的情况。宋代崇尚风雅，借用或点化唐人诗句入词，或借用唐诗立意，或隐括唐诗为词，是相当普遍的文学现象。喜欢隐括唐诗入词的宋代著名文人有晏几道、苏轼、贺铸、晁补之、周邦彦、朱熹、辛弃疾等。在元曲中，同样能见到许多取鉴唐诗的例子。“曲状元”马致远的杂剧《江州司马青衫泪》，系以白居易诗《琵琶行》化出；其散曲名篇《天净沙·秋思》，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它“深得唐人绝句妙境”。元代四大爱情剧之一的《墙头马上》，其素材源于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据朱玉麒《戏曲作品中的李白形象研究》，出现李白形象的元剧就有《柳眉儿金钱记》、《冻吟诗踏雪寻梅》、《李太白贬夜郎》、《李太白醉写秦楼月》、《李太白匹配金钱记》、《采石矶李白捉月》六部。^[1]由此亦可见李白其人其诗对元代文人的巨大影响。此外，元散曲在字面上也多有取用、化用唐诗的，兹不举例。尤令人称奇的是，小说《红楼梦》第62回中“湘云醉眠、落花满身”的细节描写，竟也源自唐诗——中唐诗人卢纶《春词》云：“北苑罗裙带，尘衢锦绣鞋。醉眠芳树下，半被落花埋。”^[2]

[1] 《河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10卷第2期。

[2] 《全唐诗》第9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189页。